

11.01

金牛文史資料選輯

(四)

文 史 資 料 研 究 委 員 會 編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成都市金牛區委員會

87
28.

前　　言

本辑的前半部份是人物专辑。共11人。其中7人是金牛区人物，4人是我区作者撰写的外地人物。他们每个人的经历不同，政治态度各异。但是，都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面貌。内容大都是作者亲历、亲见。我们在编辑的时候，对原稿所叙事实，未加任何更动，只对某些存疑的地方，如年代、人名、单位名称等，作了核实。

关于曾次金的三篇资料，是市政协征集到的，同意我们先行利用，谨此致谢。

本辑后半部份涉及的范围较广，部份资料是相当珍贵的。如北山农场，是我区第一个用现代科学种植作物的农场。华阳县孤老院和栖留所，详尽地叙述了解放前乞丐的生活，不但是我区的文史资料，也是成都市的乞丐史。其余的如“成都市花果森林园艺业同业公会成立经过”、“我参加了中原战役”以及有关川大的两篇资料，也都是值得一读的。

编　　者

1987年10月30日

目 录

- 我的行医生涯 冯仲泉口述、冯贵明、刘光泉整理(1)
田八味 汪洪定(9)
廖士祥先生生平事略 周开培(12)
龚向农先生生平事略 周叔厚(18)
恽代英在武汉 张宏济(25)
为国捐躯的颜泽光 陈学波(30)
朱伯丕和岷江纵队第五支队 周永享(32)
我的姨父董宋珩 蔡伯鈞(37)
我的父亲余安民 余国璋口述 余国玺整理(41)
记成都县恶霸曾次金 戴光鼎(49)
曾次金的血腥发家史 胡重成(56)
我在曾次金家中避难时的见闻 卢凤阁(60)
坏事做尽的石肇武 众目 维翰(73)
灯塔农业生产合作社创办始末 石羊场乡党委(96)
严氏墓园和北山农场 孙 勤(102)
成都市花果森林园艺业同业公
会成立经过 (附成都花木俗名考) 陈思甫(106)

- 出国展览的金牛区出土文物 史占扬(118)
龙潭乡出土的后蜀何公墓志铭 王建民(124)
华阳县救济院、华阳县栖留所 葛森(127)
临解放时川大进步同学的活动片断 贾质量(138)
川大学生反对黄季陆任校长的经过 王师禹(149)
笕桥空战目击记 陈德维(157)
邹楠起义经过 邹名贤、邹名扬(161)
起义前后 吴耀中(164)
中共驻渝人员返回延安的经过 王新钿(172)
土城之战亲历记 葛维翰(175)
我参加中原战役的回忆 杨正华(178)

我的行医生涯

冯仲泉 口述 冯责明、刘光泉整理

我祖父冯仕酉（1840年—1917年），出生于新繁县崇义乡郑沙桥一个农兼商（开粮油米店）的家庭。祖父自幼好读诗书古籍，壮年投师学习中医，勤学苦奋，行医数十年，得名“冯小儿”。1917年病逝崇义桥，终年77岁。

我父亲名久安，字登长，（1876年—1945年）。祖父逝世后，迁至今牛区天回乡白塔村。父亲自幼继承父业，亦医，亦农，以医为主。他医术精湛，具有良好的医德医风，在崇义桥，斑竹园，三河场，天回镇方圆数十里范围内，颇有名气。

父亲好交医友，新都县的杨礼先（内科）、相国治（内、外科）、王仲孚（儿科）、冯谓之（内科）；新繁县的薛八老师（内、外科）、黄书田（内科）；成都县的沈玉禅（内科）、陈责孚（针灸科）、谢栓容（儿科）等。都与父亲经常往来，相互切磋，取长补短，冯氏儿科的发展，得益不小。父亲在几十年的实践中，总结了不少行之有效、疗效较好的秘方，传于后代，如疏风清热，化痰止咳的“太极丸”、

清热下结，荡涤腑实的“小红丸”、清热熄风，芳香开窍的“四象丹”、镇惊安神，强心定志的“辰珀散”、诸症腹痛，行气止痛的“桔核散”、清热散结，并治疗小儿口疮，单双乳蛾的“吹口丹”、芳香开窍，止痉，温中散寒，止痛的麝艾等验方。尤对儿科的（麻疹）、（牛痘、水痘）、（急惊风、慢惊风）、（疳积）疗效尤佳。

民国26年（1937年），患儿曾××，男，3岁。父亲曾介眉，住新都县城关，开酒庄铺。患儿高烧反复不退十余天，惊风后喉中痰鸣如拉锯声，服多药未效，求治于父。我父用家传“太极丸”、“四象丹”并配合汤剂治疗，病愈后，病人家为表示感激，常用大曲酒酬谢。又如民国15年（1926年），熊××，男，4岁。家住矮堡店（现天回乡莫龙村七组），患疳积，双目已看不见东西。家父用“四叶鸡肝散”治愈。熊××活了57岁，于1980年去世。

我生于1920年，住天回乡西塔村。读过几年私塾。1937年开始随父亲学习中医。先后精读过《伤寒论》、《本草纲目》、《医宗金鉴——伤寒，金匮，儿科，妇科篇》、《温病条辨》、《温热经纬》、《内经》、《难经》、《医学五则》、《医方捷径》、《串雅内，外篇》、《雷公炮炙药性赋》、《幼科要略》、《幼幼集成》、《汤头歌括》、《医家四要》、《濒湖脉学》……等名医古籍。1941年，在本市长顺街和陈玉林（外科，针灸）开诊所，诊治内儿科疾病。抗日战争中，日本飞机轰炸成都，人心恐慌，社会紊乱，乃回家继续随父亲诊病。1946年6月，父亲积劳成疾逝世。

世。

父亲逝世后，由于我当时年青，资历浅，在崇义桥，斑竹园开业，几个场期，未能诊得一病。病人和群众的心目中，知道有老“冯小儿”，还有个少“冯小儿”，但老“冯小儿”已经不在世了，年青的“冯小儿”医疗技术究竟如何？病家信疑参半，想试探一下我的手艺。1946年夏初，崇义桥名医刘庆波之侄儿在成都读书，身患重病，医治无效，回家求治。证见：反复发烧，神昏谵语，大便数日不解，舌质红绛，苔黄腻，脉洪数。病家请了当地几个较有名气的中医，我也被请去。刘庆波要求医生各自先谈辩证立法、选方用药的道理，然后评议选方。结果我的以通腑泻热，荡涤实热的药方被选中。病人服药后，第二天热退身凉，续服数剂痊愈。刘庆波乃一方名医，其侄之病不能治，而我却一诊即中，数剂而愈，名声顿时传开。同年秋天，在斑竹园诊治一个较有社会地位的病人，病家把医生请到家里往下治病，若病不见好转，医生不能走。病人约50多岁，体胖，赶场回家时突然昏倒，不省人事，牙关紧闭，四肢颤动，随即口吐涎沫，喉中痰鸣有如拉锯，脉滑数，诊断为“痰热中风”。急予家传“四象丹”开窍熄风，再以清热化痰“太极丸”，配合疏风涤痰通络的汤剂，艾灸人中，百会，风池，合谷，足三里等穴位。一诊后，见病情好转，人已清醒，口能张开，余证尤存，复诊十余次，基本痊愈。病家为我挂红送匾。

医道之术，博大精深，学无止境。为了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我经常汇集医界朋友，以学他人之长。如：崇义桥的

刘庆波，相伯昭（现为成都市名老中医），彭步云，陈万松（现为成都市名老中医），班竹园的薛登坤父子，三河场的杨文早，白水寺的吴世安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除搞好本职工作外，还协助人民政府清匪反霸，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1951年地区规划后，加入成都市卫生工作者协会。一般都在天回镇诊病，并积极参加防病灭害工作。1952年响应政府号召，发展人民医药卫生事业，在一无资金，二无人，三缺办公用具的困难条件下，我和几个同道集资约一百万元（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一百元），成立了天回镇联合诊所，由我兼任所长。由于经费不足，发工资困难（每人每月20元），我们发扬了艰苦创业，勤俭办院的精神。在我的带动下，医生到附近的场镇赶场诊病。所收经费，回院全部上交，星期天也不休息，参加医院各种建设性的劳动……等，使医院不断发展。

为适应新中国的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民健康事业的需要，1955年3月，我报考四川省成都中医进修学校，进修学习一年，聆听了著名中医专家如：蒲辅周、王伯岳、王文鼎、李斯炽、杜子明、李重人、邓绍先、何伯勤、黄国章、凌一揆、余仲权等的讲课，在理论上有了更进一步的提高。结业时欢送了李重人，蒲辅周，王伯岳，王文鼎四老师上北京工作。1958年，我参加了成都市卫生界代表团，上北京参观学习，受到了部分中央首长的接见。

随着医疗卫生事业的蓬勃发展，1958年，医院的资金，技术人员都有了一定的发展和规模，诊所改为天回地区联合

医院，我被选为院长。1960年，我调郊区中医研究所任职，当时主要研究本区各位老中医的医绩，整理他们的中医单方，验方，三年自然灾害，国家困难经费不足，研究所于1962年上半年撤消，本人随即要求回天回地区工作（此时医院改为天回公社卫生院），继续选任院长，并坚持在门诊看病。1963年初，经区卫生科批准，开始带长子冯贵明学习中医。那时由于三年自然灾害，水肿病，黄肿病，单腹胀，疳积病，虚痨病，麻疹都较多。对以上病证，都有一定的研究治疗。“四清”后落选。无官一身轻，父子之间，集中精力，研讨医理，整理临床医绩。1980年上半年调成都市干部疗养院中医科负责，诊病兼带实习徒弟3人。1981年底，由于年老多病等各种原因，申请退休，留于天回卫生院（现为成都市金牛区中医医院）。

我行医四十多年，在继承家传儿科的基础上，通过进修学习，临床实践验证，以及各名家的指点，更丰富了冯氏儿科的内容。我对家传秘方作了进一步的研究，临床效果研究如：太极丸有疏风清热，化痰止咳，临幊上对小儿的风寒，风热咳嗽，咳嗽痰多，喉中痰鸣，喘咳有著效，对老年人的慢极咳嗽也有显著疗效。小红丸清热下积，荡涤胃肠实热，对食积，痰积，热积，虫积等有形的积证有著效。桔核散对小儿的各种气滞腹痛，伤风腹痛，诸疝腹痛有著效，并对成人的肝郁气滞的疼痛，胃脘痛，肠鸣腹痛有显著止痛效果。对辰珀散，四象丹，吹口丹，四叶鸡肝散……等，经几十年的临床验证，效果比较满意。疾病的产生，发展，随着社

会、环境、卫生、文化的变化而变化。比如：解放前社会文化经济落后，卫生条件差，各种传染病较多；三年自然灾害，人民生活困难，营养不足，肿病，疳积病较多；近年来生活条件好，独生子女多，多衣精食，偏嗜又成为小儿疾病衍变的重要原因。例如：1964年春节麻疹流行，由于天回地区方圆二十里地处农村、文化落后，缺乏卫生科学知识，很多病家不把患者送医院治疗，对患儿的护理常因不按科学方法而导致病情加重或死亡。有的在家用柏树叶薰，反将患儿关闭屋内，这种不科学的方法，使很多麻疹患儿死掉。在这种情况下，我常和其他医生送医送药，上门服务，向病家反复宣传麻疹的防、治、护知识，减少和避免了麻疹患儿因防治护理不当引起的病情加重或死亡。

医生对病人应有恻隐同情、无限关怀之心，不可因病重而弃之。1984年秋，简阳县一位五十多岁的病人，患肝脾肿大，引起腹水。患者经几家大医院检查治疗，效果不佳。病人慕名专程求治，旁人说“大医院都治不了的，你何必搭手，若治不好有损名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当时认为“只有未识之症，没有不治之症，如果都不治，岂不是要病人等死”。对病人我首先认真询问，仔细辩证并鼓励他建立病能治好的信心。经过两个多月的细心诊治，治好了患者。在门诊治病中，对于重病不愿住院者，过二、三天后要去拜访一次，关心病人服药情况和证状的转归，从中吸取经验，加以总结。

我自悬壶行医以来，数十年如一日。“四清”前，长时

间没有星期天，节假日。除诊病外，带领职工勤俭办院，参加各种劳动，预防接种，搞好血防等工作。不论寒暑昼夜，病人随到随诊（不管在家里或在医院），不摆架子，不训病人。每年诊治病人近两万人次，从来不挣外水，对于病家的酬谢，都是婉言谢绝。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常解囊相助。记得解放前本地一贫苦户陈××患霍乱，呕吐，泄泻两天，看着病人快要死去了，家里又无钱医治，病家万分着急，我知到即刻送医送药，挽救了病人。我还常以家传秘制丸散，赠给经济困难的患者，使他们得以康复。

医术是为病人服务的，我从来不把祖传秘方视为私有，总是毫无保留地带徒传医。七十年代以前，在我的指导下，把家传秘方献给了医院，亲自动手制成成品，并把用法、服法告诉医院同道，使大家都可以应用。从1969年秋开始，合作医疗如雨后春笋般涌出，我为培训赤足医生，积极编写教材，讲授中医基础课程。赤足医生轮流前来见习中医门诊，热心指导。现在他们都可以独挡一面地工作了。我的儿子冯贵明，1963年开始随我学习中医，多年来由于党和政府的关怀，勤学苦练，刻苦钻研，基本上掌握了冯氏儿科的精髓，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经验。1980年4月，被国家录取为全民中医师。小女冯贵兰，1981年随我学习中医，现已基本上能处理儿科常见病多发病。

现在我已是快要七十多岁的人了，虽然年老多病，体弱，一想到那么多病儿需要我治疗，就不顾自己，坚持上班。如：有一次发高烧后，咳嗽剧烈，胸透为肺炎，自己已

经天旋地转，身不由己，不能支持。医院领导和同志对我很关心，都劝我休息。我看到病人的疾苦，是好象自己的疾苦一样，第二天仍照常上班诊病。近几年社会活动，会议较多，有时一开就是几天，回院后第二天照常诊病。

几十年来，我在为人民防病治病中，做了一些工作，学术上经验有一些。成就不大，贡献不大，但党和人民却给了我很高的荣誉。多次被评为市、区、乡、院的先进工作者，区、乡人民代表，中华医学会成都中医分会理事，市政协第三、四、五、六、七届委员，金牛区政协常委，1985年被授予成都市名老中医的光荣称号……等。

现在，我虽已至晚年，为了振兴中医事业，继承和发展祖国的医学遗产，为人民的健康，为四个现代化的早日实现，我要抓紧时间，将我的点滴经验整理成文，贡献给人民的卫生事业。

1987年10月

田八味

汪洪定

六十年代初，我区老一辈的中医师大多健在。他们分布于我区城乡各医疗单位中，或带徒行医，或潜心著述，为继承祖国医学遗产，起了一定的作用。

田八味，就是当时我区较有影响的一位老中医。他本名田鹤鸣，四川简阳人，因他开的药方一般不超过八味，所以群众赠给他“田八味”这个雅号。

田八味生于公元1883年，1980年病逝，享年97岁。他15岁上成都，初学银匠，30岁跟随叔父改学中医。学成后，在青羊宫仙寿药号坐堂行医。解放前，生活较为清贫。解放后，家住苏坡乡金沙五队，仍以行医为业，每天早出晚归，病人每请必至。但更多的时间是在青羊宫庆丰茶园，边喝茶边诊病。1965年初，田老脚部被车碾伤，在家养病，不少患者遂登门求医。由于病人传名，看病的人愈来愈多，由学徒替写处方。学徒用毛笔正楷竖书，写得一手好字。加之药的味数少，一付药一般不过一两角钱，经济便宜，又能治疗疾病，患者满意；药剂员检药方便省时，也极愿检这种单子。

由于以上原因，田八味的名气随着他的处方笺飞遍蓉城城乡各地，愈来愈红。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得和大队干部联系，在该队窑场坝设立诊病地点，由大队统一收挂号费，满足了更多的患者看病。

1965年11月，金牛区卫生局为发展中医，满足群众需要，特聘请田老到区医院看门诊。杨家全局长问他要多少钱一个月？他答道：“只要求每月六十元、够一家三口人生活费就行了。”田老行医一生，不为名不为利的精神令人钦佩。田老到区医院后，月薪定为86元。

田八味用药味数少，而又能治疗疾病，这里有什么诀窍？看他的处方，行家都知道：他学的是张仲景的《伤寒论》和《金匱》，处方的特点是用药少而精。例如：感冒患者用麻黄汤或桂枝汤；咳嗽患者用小青龙汤或麻杏石甘汤；心肾不交患者用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等等。以上处方都不过七八味药而已。但用这种处方，要求看准症候，增减一味药都必须丝丝入扣，方能奏效。如用药不当，可能给患者增加痛苦。因此，用这种处方难度较大。田老一生知难而进，锲而不舍，这种精神值得学习。

田八味的好景不长。他到区医院上班半年以后，史无前例的文化革命开始了。由于他是老中医，颇有名望，平常爱穿长袍，见人点头哈腰。这些都构成了革命的对象。起初，只被大字报轰了一轰。到1969年清理阶级队伍时，由于他有一个儿子在台湾（至今下落不明），被列为特嫌。造反派硬说他有一个皮包，里面藏着特务名单。于是，一场深挖细查

特务皮包的活动全面展开。田八味这位曾红极一时的名医，终于被打成反革命特务，到了“黑”得吓人的地步。田八味在受难的时候，暗地对亲属说：“我决不能死，我死了给你们留下罪名永远洗不清啊。”所幸的是，他以年老伤残之躯，经受种种磨难，而终于拖到了“四人帮”覆没，自己恢复名誉的一天。

（本文承蒙田老的孙女田玉霞医生提供情况，特此鸣谢。）

1987年7月11日

廖士祥先生生平事略

周开培

先生名士祥，字仲和。1895年（前清光绪21年，岁次乙未）7月11日出生于成都县青苏乡董家大田。1964年阴历正月初三，因患高血压脑溢血症，医治无效，卒於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享年70岁。在追悼会中，各方亲友、省统战部、省政协领导和成员，均来吊唁。骨灰安厝於原出生地成都市金牛区青苏乡董家大田旧居墓地。

先生在诸兄弟姊妹中，聪颖敏捷，勤奋好读。十岁时，就读於成都县立小学堂（校址在成都市青龙街），以成绩优异，毕业后升入成都县中学堂第五班肄业（该校即现在成都市第七中学的前身，当时校址仍在成都市青龙街）。在成都市中学堂毕业后，考入四川省法政专门学校攻读。校长系熊晓岩先生。当时该校共办有两种班，即官班和绅班。官班类似干部培训班，绅班为学生直接考入的班。先生在校时，以成绩优异见重於教师和同学，惟以家境困难，食宿各费，难以支付，几至辍学。幸得校长熊晓岩先生和亲友赞助，始得于1917年完成学业。

1917年在法政学校毕业后，应同乡熊子骏先生之邀，赴重庆担任蜀新报编辑。陈毅和熊子骏先生担任主笔。新蜀报是当时重庆的进步报刊，系熊子骏、周钦岳、肖华菁等进步人士所合办。当时，朱德、刘伯承等均在重庆，先生与之过从甚密，曾和朱、陈、刘、熊等人合拍一照。这张照片，我曾见过，可惜在成都解放前夕（当时正是胡宗南部队盘据成都市的白色恐怖时期），家中人深恐胡宗南部队搜出，为了避祸，将此珍重照片毁去，深为可惜。

新蜀报系进步报刊，深为反动政府所忌，后被查封改组。先生、熊子骏先生和陈毅等脱离新蜀报。后经熊子骏先生介绍，先生乃到熊克武（当时四川督军）将军司令部担任秘书。1924年，熊克武将军奉孙中山大元帅令，改所部番号为建国川军及川、滇、黔联军，率部驻防湖南、贵州一带地区，1925年6月，取道贵州、广西边境，开赴广东。延至同年8月，全军达到广东境内，驻扎连山。先生亦同时随军前往。后因蒋介石背信弃义，将川军全部缴械，将熊克武将军囚禁虎门，三年之后才释放（详情请阅成都文史资料第4辑40页——54页）。廖世祥先生在乱军中改装支身逃回四川。

先生由广东回四川后，1926年，应川军第29军王铭章师长之邀，担任该师秘书长职务。该师驻防川北广元、什邡、德阳、潼川等地。1927年到1936年，由师部外调，先后担任什邡县长、广元县长、潼川县长和潼川驻区事务部主任以及合川县长等职务。

1937年抗战兴起，王铭章师长奉命率部出川抗日，先生